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经典译丛

马骏 牛美丽◎主编

公共行政学中的 批判理论

戴黍 牛美丽 等◎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经典译丛

马骏 牛美丽 主编

公共行政学中的 批判理论

戴泰 牛美丽 等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戴黍, 牛美丽等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经典译丛/马骏, 牛美丽主编)
ISBN 978-7-300-09322-2

I. 公…
II. ①戴…②牛…
III. 行政学-研究
IV. 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4656 号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经典译丛
马 骏 牛美丽 主编
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
戴 黍 牛美丽 等 编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插页 1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8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虽然这是一个共识瓦解的世界，对于什么是最好的研究，我们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应该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研究必须有助于促进知识的增长，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反思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而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研究，欲实现知识的增长，都必须充分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知识的增长是继承性的。我们都是建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完善某一领域的研究，从而不断推进知识的增长。此外，欲判断我们的研究是否真的推动了知识的增长，还需对研究现状有非常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否则，我们可能在重复研究而不自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公共行政学以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似乎越来越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很大的隐忧。其中，尤以研究质量方面的问题最为让人不安。最近的一些评估发现，数量越来越多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许多研究根本没有文献评估，或文献评估不全面，从而导致毫无意义的重复研究，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推动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增长。一些研究虽然有文献评估，但是，仅仅评估国内文献，而忽略了国外高质量的基本相关文献。这一方面导致了重复的恶果，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为了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增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研究人员齐心协力，编辑和翻译了这套“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经典”。从 2005 年底开始，我

们一直在筹划这套译丛。由于单篇论文的版权联系非常复杂,编辑、出版计划一直进展迟缓。后来,幸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晶女士及其同仁的鼎力支持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国外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的资助,这套译丛才得以最终面世。

这是国内第一套按研究专题精选的公共行政学译丛。本译丛具有如下特点:(1)按照研究专题筛选论文;(2)按论文的引用率或学术影响挑选各个专题下的论文;(3)论文主要来自于美国公共行政学权威杂志,同时也兼顾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当然,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在每一个领域只挑选十五到二十篇论文,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尽管每本书的编者都尽最大努力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并且部分论文集的挑选还参考了国外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但是,囿于篇幅、版权费和我们的偏好等,在论文的挑选上难免有所遗憾。当然,这也为我们今后的文献梳理提供了一个改进的空间。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质量的不断提升,有助于各位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马骏 牛美丽

2008年8月30日于中山大学

致 谢

译事艰辛。所幸多有师友鼎力之助。

感谢马骏教授。没有他的无私教诲，我不可能接触到“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这一极具挑战而又意趣盎然的研究领域；没有他的悉心指导，我将无法完成诸多艰涩的文献甄选、术语校定工作；没有他的严格要求，我或许到现在仍然不能交付译稿。

感谢 Richard C. Box 教授。不论是面谈，还是在电子邮件中，他严谨、周密的批判风格都十分一致地得到体现。他对我们的翻译提出了许多直率而极有裨益的意见。

感谢牛美丽博士。她以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耐心关注着从选文、翻译到定稿的每一个阶段，并提供了很多可贵的建议。

感谢翻译的合作者们。虽然他们的名字仅仅在某篇译文之后出现一两次，但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却是贯穿全书的。他们以极强的责任心与团队精神，共同完成了译文的定稿。当然，文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完全由我本人为之负责。

戴黍

编译者序

Jurgen Habermas 等人曾提出，社会科学中有三种类型的研究：解释性（或实证的）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1]就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而言，解释性（或实证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则较受忽视。然而，后两种研究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正如 Jay D. White 和 Guy B. Adams 所说：

大量历史和认识论证据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途径——即使被冠以科学这一高度实证的标签——对公共行政研究而言是足够的。如果研究要由理性指导，那么，研究途径的多样化——既尊重实践理性，也尊重理论理性——就似乎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公共行政的知识和理论发展应该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假设检验、案例研究、行政和决策过程分析，以及对该领域的整体或部分的历史诠释、演绎论证、哲学批判和对行政经验的个人反思。^[2]

批判性研究力图超越对经验规范的描述和对意义的理解，通过使人们认识到那些决定自己的信仰或行动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因素，来寻求变革，将自己从各种压迫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3]在这一意义上，批判性研究对公共行政学，乃至对人类自身，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它所提供的知识并不虚伪地承诺“价值中立”，而是主旨鲜明、态度坚决地致力于人类的自我解放。实际上，批判性研究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或称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已经开始逐渐被一些学者所接受、重视与发展。在公共行政领域，虽然对批判性研究

方法的运用十分有限,但已经出现了一些视角独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成果仍主要集中在英语世界中。对这些成果加以深入的了解与分析,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公共行政学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

笔者于2004年9月进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合作导师马骏教授建议笔者以“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同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相关英文资料,并鼓励笔者翻译其中的重要文献。本集选编的9篇文章,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目前所见,最早将批判理论运用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尝试体现在 Robert B. Denhardt 发表于1981年的论文《面向公共组织的批判理论》中,Denhardt 对公共行政理论的主流文献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公共行政领域中理论与实践传统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因而必须改变我们看待该领域的方式,由此引入了批判的视角。Denhardt 不同于主流学者的研究风格、敏锐的批判意识以及超前的理论触觉,奠定了他作为公共行政领域批判理论先驱的地位。

在《“真”实在别处——批判的历史》一文中, Richard C. Box 和 Cheryl Simrell King 基于批判理论,提出要解构“现在”在传统的历史解释或分析中是如何被定义的这一基本问题。他们认为,一个人若要“重写”现在,就必须批判地对历史“数据”背后的假设和方法作出考察,以确定什么东西可能被忽略了。即,谁的故事被隐默了,理论家是从何时开始,仅仅依靠过去事件中的“伟大的故事”或“伟人”去揭示支持统治政体、霸权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元叙事的。Box 和 King 希望借助对“真相”、“事实”的深层揭示,建立或重构某种批判的历史。

Camilla Stivers 在《社区女人与机关男人——为公共行政学构建一种可用的过去》中展示了女权主义批判这一十分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在从性别的角度对行政国家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基础上, Stivers 指出,对行政国家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从中热中于提高行政方法效率的“机关男人”的角度,而且还要从“社区女人”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寻求并实现了针对社会疾患的政府责任的扩展。她强调,通过将公共行政学领域视为一项既关注程序又关注实质的理性事业、一个重构的历史、一个适合于公共行政学的“可用的过去”,也许同样会加深我们对那些隐藏于持续不断的程序改革诉求之中的真实含义的理解。Stivers 对于公共行政历史的重构、对公共行政合法性基础的探索以及对公共行政替代方案的思考,体现了女权主义批判方法与众不同的进路与趣向。

Nancy Meyer-Emerick 在《生物政治学、统治和批判理论》中介绍了“生物政治学”这一涉及人类的统治、等级和服从这些植根于进化论的理论,并以此为线索介绍和揭示了批判理论家们对孕育了虚假意识和单向度生命的统治和控制所

进行的精确分析。文章认为, Noelle-Neumann 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民意的集体“沉默”现象, 为生物政治学、批判理论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

在《私人生活与反行政》中, Box 提出了“私人生活”和“反行政”的概念。他指出, 公共行政学的许多理论假定公民是或者应当是深入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的。然而多数人并未潜心于公共话语, 这使他们容易受制于少数参与其中的人们的行动。公共管理者则是处在公众行为和对私人生活的潜在分裂性或破坏性影响之间的持久缓冲器。Box 认为, 在对行政行为采取反行政姿态时, 公共管理者应当保持批判意识, 对公民的私人生活加以保护。

在《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中, Box 进一步认为, 制度实践与正式组织一直被用来维护财富与权力的优先分配, 因而公民自治的潜能始终受限于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基于批判立场, Box 指出, 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替代选择, 使代表居于同等地位、简化行政过程, 将推动和促进市民自治。Box 对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历史、现实以及某些核心概念、具体案例所作的批判分析极为深刻细致。同时, 他对后现代理论、女权主义思想等的广泛吸纳与参考也十分引人注目。

Laurence E. Lynn, Jr. 在《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分析》中对新公共管理(NPM)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与分析。他认为, 公共部门改革要获得成功, 就必须协调处理好几种影响公共管理实践的基本的紧张关系: 第一种紧张关系存在于法律政治传统与管理的普遍原则之间, 第二种是基于公民及其代表受自利性驱动这一假设的治理模式与基于人们通过信任和合作来表达其偏好这一假设的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批判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Lynn 指出, NPM 没有也不能调和这些紧张关系, 其支持者们实际上时常倾向于偷偷地清除这些紧张关系。

在《重铸批判理论——维布伦、解构与理论—实践鸿沟》中, Arthur Sementelli 和 Charles F. Abel 指出, Thorstein Veblen 的经济和社会思想构成了批判理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先进形式。作为一种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理论, 这一“进化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批判理论有着相近的目标、方法、假设和批判思想。不过, 它的批判方式却更为完备: 它既否认解放和互动民主的多元论必须具备适应性, 也否认其必然提供“最适合的”制度。然而, 与一般的批判理论不同, Veblen 以对非目的论与非决定论的社会进化的强调, 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形态, 从而弥合了理论—实践鸿沟。

Lisa A. Zanetti 的论文《推进现实——批判理论与公共行政实践的结合》阐述了公共行政学中批判理论的现状, 指出批判方法中存在的成熟以及造成这一状态的几方面原因。她认为, 为了形成一个整合性的研究计划, 公共行政学中的

批判理论必须积极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此她提出,参与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可能有助于推进现实。理论与实践分离的问题,实际上是所有批判理论都必须面对和克服的。Zanetti 就此所提出的洞见,对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

正如马骏所指出的,虽然 20 多年来,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累积了许多文献,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研究仍然非常落后。这种落后不仅表现为研究重心的不明确,还体现为研究方法的模糊,即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都没有遵循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各自的规范与标准,因而在研究质量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未能促进知识的增长。^[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诠释研究、批判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研究空白,与国外学术界相比,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显得颇为欠缺。对中国而言,批判意识、批判精神与批判方法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就目前所见,国内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成果中,无论是专著、教材、译著,还是学术期刊(较有代表性的如《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学》等),涉及批判理论研究的,极为罕见。反倒在外国哲学、科学哲学以及文史、艺术领域中,更容易找到批判理论的踪迹。

作为一种处于弱势然而不容忽略的研究途径,批判性研究理应在公共行政领域取得一席之地,并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新的生长点。作为解释性研究与诠释性研究的补充,加强批判性研究,以此促进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的治道变革,是极具价值的。以 Jurgen Habermas 为前导,Robert B. Denhardt 为先驱,Guy B. Adams、Jay D. White、Camilla Stivers、Richard C. Box、Cheryl Simrell King 和 Lisa A. Zanetti 等为骨干,公共行政学的批判理论阵营已有一系列高水平的、视角独特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论,这些研究成果最为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其一,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真实世界”与“真实事件”是怎样的?与此相关,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走过了怎样的历程?人们对这一历程的描绘与书写是充分、公允与富有启发的吗?其二,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理论、实践、方法是否具有颠扑不破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其三,存不存在和主流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务系统有所不同的替代选择?其四,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脱节甚至背离的困窘?

显然,上述问题也是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者乃至整个公共行政学领域所必须面对的。被动地“接受”现状、得过且过地“顺应”潮流定势、习以为常地将历史与现实视为“当然”,从来都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批判性研究首先表明的是一种积极敏锐的批判态度,鲜明地体现为拒斥决定论、否定主流意识形态与挑战现

实；其次，它展示了对公共行政学中现代性的困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分析，强调了作为“体制拒绝者”的历史分析立场以及女权主义的公共行政历史视角；再次，它还在超越技术理性、关注“交往模式”与“自我反省”等批判基础上，积极探索了主流公共行政的批判性替代选择；最后，它又深刻揭示了批判理论的实质、缺陷及其根源，力图以“进化的批判理论”、“参与式研究”等尝试消解公共行政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本集旨在介绍英语世界中重要的公共行政学批判理论成果。如果有幸能借此为公共行政学的批判意识、批判精神与批判方法的培养与建立贡献绵薄之力，乃至提供偶有助益的研究资料与理论依凭，则笔者之愿足矣！

戴黍

◀ 注释 ▶

[1] Habermas J.,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J. J. Shapiro, trans.). Boston, 1971.

[2] Jay D. White & Guy B. Adams: 《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6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 参见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14、16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 参见马骏：《推荐序》，见 Jay D. White & Guy B. Adams: 《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II 页。

目 录

面向公共组织的批判理论	1
“真”实在别处——批判的历史	16
社区女人与机关男人——为公共行政学构建一种可用的过去	37
生物政治学、统治和批判理论	54
私人生活与反行政	69
代表优先与行政效率的替代选择	85
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分析	102
重铸批判理论——维布伦、解构与理论—实践鸿沟	120
推进现实——批判理论与公共行政实践的结合	140

面向公共组织的批判理论^{*}

Robert B. Denhardt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现在的公共行政领域存在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很可能部分地被解释为对危机的认同，或者部分地被解释成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所依据的似乎是不太确定的、历史的或者哲学意义上的原因。^[1]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受到了伟大传统的困扰：我们从各个方面“追根溯源”，但我们却发现我们与祖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例如，我们结合民主管理以拓展其标准原则的兴趣，时常与把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科学的”课题来进行研究的意图发生冲突。^[3]同样，在发展公共组织理论和改进行政实践方面，有时候我们会在重新确定兴趣上遇到困难。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地探究我们这个领域演化的特点，同时不断提出下列问题：怎样才能真正地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充分完备的办法来理解现代社会的公共行政制度？

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直不懈地努力着。我们查阅“批判”理论的最近文献，尤其关注发展公共组织综合理论的著作的含义。我们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作为哲学理论的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理论活动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回顾历程中，我们集中关注的是 Jurgen Habermas 的著作，他或许是当代最著名的批判方法界的大师。最后，我们将评估运用批判视角来反思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

^{*} 载《公共行政评论》，1981（11）/（12），628～635页。

众所周知,当今的批判理论源于黑格尔哲学,尤其植根于 Hegel 对理性的揭示,以及这种理性中所包含的自由历史观。^[4]这种历史观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事实”看作自由进化的偶然部分,所以隐藏的事实比暴露的事实更重要,因为现存的事实被看作制约自由进化的因素,因此它被视为消极因素。为了允许自由在未来的发展,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露当前的假象。它是通过行为批判来实现这一点的。

Hegel 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观点理所当然地成为 Karl Marx 工作的中心任务,Marx 利用 Hegel 的辩证思想来分析社会的决定因素。^[5]Marx 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看似固若金汤,事实上却是矛盾重重、千疮百孔。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当前社会的局限性将给新条件下的自由和人类解放让路。

面对不确定的因素,城市管理者要从最坏处打算,充分估计即将来临的财政赤字规模,并要求各部门从深层次着手作好计划。

重要的是,仅仅在哲学层面上努力演练是不够的,必须要代之以具体的斗争。Marx 用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评论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正是通过理论和实践尤其是革命的实践的相互结合,批判将导向人类解放。

与 Karl Marx 的进路不同,Max Weber 认为制度化权力的扩张并不是基于经济系统而是基于现代生活政府化作用的增强。^[7]因为他把政府机构当作最合理的实现社会终极目标的组织方式,他把日渐依赖这种政府机构的方式描述成社会“合理化”的方式。由于缺乏 Marx 的辩证观点,Weber 把这种社会发展方式不仅当作一种功能,还把它当作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逆转的方式,将社会引进一个“铁笼”,在这个铁笼里人的自由和个性受到严格的限制。^[8]奇怪的是,当 Weber 试图证明这种威胁存在的时候,他实际上含蓄地为社会日渐政府化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对于合理性和统治权之间的相互纠葛问题,Marx 和 Weber 都曾讨论过,它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家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身是 19 世纪 20 年代初始建于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协会。^[9]这个由私人捐助成立的协会为激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立的论坛,这一论坛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1930 年,Max Horkheimer 成为该协会会长,负责行政事务并

兼任学术领袖。在紧接着的数十年里,不论是在德国期间还是后来在美国“被流放”的日子里,Horkheimer和他的同事们开展了从社会学经典基础到美学与大众文化的大范围的研究工作。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始终致力于坚持辩证思维的传统,并且热衷于发展社会批判理论。Theodore Adorno、Herbert Marcuse、Erich Fromm、Leo Lowenthal、Walter Benjamin和Franz Neumann等人保持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并且坚持以批判的视角看问题。

在一篇对于该协会而言几乎算是“意见书”的重要论文里,Horkheimer试图对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加以区分。^[10]按照Horkheimer的观点,后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表现是非常相似的,它由若干命题组成,这些命题所涉及的是在逻辑体系中彼此关联的给定对象,并直接与实证经验中的可观测事件相联系。相应地,科学家把传统理论视为资料积累的胜任者,而资料积累将为关于给定对象的理论陈述的精巧构建提供条件。Horkheimer的看法是,科学的这一角色和人的某种特殊利益相吻合,尽管这种利益很少被提及。科学在发展解释性陈述和预言性陈述中为控制提供理论基础,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的控制上,后来又表现在对人类的控制上。

和传统理论这一概念形成对照的是,批判观念承认我们自身的努力和社会条件强加给我们的限制因素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而对此我们仅仅隐约地有所意识。正因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成为揭露这些张力或冲突的工具,并由此允许我们追求自己的自由。“批判思想……今天确实通过努力得到了激发,以克服这些张力,并且消解个体之间的目的性、自主性和理性,以及那些使社会得以建立的工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冲突或对立。批判思想在与人自身的冲突之中把握人的概念,直到这种冲突被去除为止。”^[11]因为这种关系为人类的解放提供了机会,所以它必然与行动相结合,与追求个体的真正需要与愿望的行动相结合。

当代的批判观念已经被许多重要的学者加以详细阐述,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学者Jurgen Habermas,他试图对批判立场进行最全面的重述。^[12]正是通过Habermas的著作,加上其他理论家所作的补充,我们将从几个方面,尤其是与公共组织研究相关的几个方面来考察批判的方法。^[13]我们特别要考察(1)对工具理性的批判,(2)政治生活的科学化和公共领域的缩减,以及(3)知识和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试图揭示现代生活的社会统治的根源,从而为通过理性彻底实现自由开辟了道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对理性自身的挑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社会理性基础的重新界定。Horkheimer通过比较两

种推理模式对此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绝大多数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假定理性是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通过这条规则我们能够评价我们的行为是否合理。在这一意义上,理性指导着社会选择,并且借助正义、自由、暴力和压迫等语言来发表意见。相对于这种理性模式,Horkheimer 指出一个更有用的形式的日渐兴起,它只关注最受欢迎的(意指“有效的”)方式以达到既定目标。“这样,理性作为感知现实本质的感官和支配我们生活的主导理论逐渐被认为有些过时了。”^[14]

在这些条件下,政治领域不再需要将其自身与社会的标准结构、与导向“美好生活”等的社会关系加以联系。按照这种新的理解,政治就是要降低资本生产的风险和防止资本生产的紊乱。

Marcuse 在批判 Weber 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现代人对理性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特别地,他认为,作为用来获取假定结果的方法,Weber 的理性概念不仅可以不去探讨所谓的理性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社会利益,而且还可以精心构建技术控制的模式,“合乎方法的、科学的、适当的、计算的控制技巧”^[15]。由于现有的技术模式意味着统治,Weber 的理性化概念就不是批判的而是辩护的了,就此意义而言,某些行为是否正当,或许要通过其对技术理性活动所作出的贡献来加以判定。^[16]取代了理性思考和启发性的行为,我们将为现有社会机制的设计问题找到技术解决方案所做的有限工作感到满足。

Habermas 通过考察可能被用来扩展社会合理化的替代方案推进了 Marcuse 对 Weber 的批评。他们二人都同意,Weber 所依赖的对理性的技术化定义在根本上包含了对扩展统治权的意识形态上的辩护,但他们更关注 Weber 对这个必然结果的描述。相反地,他们认为一个可供替代选择的场景可能得到了发展,那么这必定是由社会创建的机构所准许的,因此这一场景有可能通过有意的选择和有效的行为而得以重建。当 Marcuse 明确了在新的科技模式中 Weber 所描述的改变统治条件的可能性时(它提供着不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模式),Habermas 则认为,由现代世界所界定的科技世界必然与目的理性行为相联系,在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希望之前,我们必须超越这样的框架。^[17] Habermas 所提出的这种努力涉及重建一个可供选择的、具有象征意义和相互沟通作用的行为结构,以确保其正当地位。

通过目的理性行为,Habermas 将“工作”领域视为追求既定目标的工具性活动。目的理性行为的当务之急是技术,是对手段—目标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通过“相互作用”(象征性的相互作用,沟通的相互作用),Habermas 将社会标准结构的建立描述为一个“公认标准联合的统治,其建立限定着行为的相应

期望值,而且必须通过相互作用的主体才能被理解和确认。”^[18]反之,违反技术规则就被认为是缺乏能力,违反公认准则就被称做“不正常”。^[19]因此,社会系统可能按照是否是目的理性行为或者相互作用的支配行为来作出划分。

Habermas 认为,依据 Weber 的合理化定义所描绘的传统社会向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更,以社会合法化基础的转变为特征。在传统社会里,目的理性活动领域深植于社会标准结构之内,在那个时候它还很少威胁到文化传统的功效。然而,在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第一次出现了永久持续的经济增长,于是目的理性行为领域得以自立。“这样,传统社会结构日渐屈服于工具性的和战略性的理性条件:劳工和商贸组织,运输、信息和通讯网络,私法机构,以及与财政管理一齐发展起来的国家与官僚体系。”^[20]而后,这样的可能性开始出现:象征性的或者沟通式的交互作用领域最终深植于突然出现的目的理性活动的领域之中,现在它们正成为社会权力结构新的合法性基础。

很明显,这样的发展对政治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篇早期的文章里,Habermas 把“公共领域”描述成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参与讨论以建立相关社会标准的场所。^[21]近来,社会利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贸易、劳动和职业中占据层级优势者来加以表达。在这种意义上,公共领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压缩、裁决或者控制了。对公共领域的这种限定和带有目的理性行为倾向的政治权力压制是相一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领域再也不必以社会标准结构、以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影响之类的指标来衡量自己。这些观念现在被纳入政治生活的新的使命之中,以维护资本使用的私有形式,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使大众的忠诚集聚到他们所处的新环境之中。于是,政治的目的就在于降低资本生产的风险和紊乱。“可以这么说,政府活动应当仅限于处理行政上可解决的技术问题,从而消除实践的问题。”^[22](在此,“实践”问题是引导社会实践的,而不仅限于实际事务。)

显然,政府在解决技术问题过程中日益增多的燃眉之急,对民主的公民权观念具有特别的含义,因为以解决技术问题为目的的公众讨论并不必要。确实,大众的参与可能会引发混乱。这样,公共领域的缩减就会导致一种普遍的公民权的非政治化。公民的角色不再是协助社会方向的选择,而只是偶尔在行政人员的选择中发挥些微作用。相应地,行政人员的职责则在于处理阻碍社会和经济体系运营的问题。正如 Marcuse 所指出的,所有这些都通过科技发展的逻辑过程得到了解释,并因向所有人增加物品和服务的承诺而变得更加宜人。^[23]最重要的是,Habermas 评论道“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它将社会的自我理解从交往活动的参照系以及象征性交互作用的概念中分离出来,并代之以科学的模式。”^[24]其